



新型城镇化 需要金融支持

张喜玲

新型城镇化建设不仅是推动经济发展与转型的重点，更是未来几年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努力方向；既是扩大国内需求的最大潜力，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新型城镇化离不开基础设施建设、公用事业和公共服务，需要加强城镇能源、供水、交通、通信、文化娱乐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住房、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城镇公共服务。作为公共物品的投入，政府财政资金支持是必不可缺的，但是由于财政资金有限，而各地区政府财政实力存在较大差异，仅靠财政资金是无法满足新型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的要求的。因此，从投资方向到具体的管理，再到具体的筹资、融资机制，需要全方位的考虑和创新。要把社会金融投入到重要位置，使其成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基础设施建设的另一主要资金来源。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还会产生各种金融需求，这涉及债券发行、股票融资、信贷投放、保险保障需求等各个金融子行业相关领域。此外，新型城镇化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意味着金融在加大支持力度时还需努力适应新形势、创新新产品，以提供新型金融资金支持服务。

伴随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作为与实体经济紧密相连的金融业，金融需求将是一个不断产生、持续释放的长期过程。新型城镇化更追求质量和效率，对金融服务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智能、集约、低碳、绿色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不仅对中小城镇基础设施贷款提出金融新需求，而且中小城镇建设、生态城镇建设的资金需求也将明显增加。在这一情况下，如何适应城镇化建设要求、构建有利于城镇化建设的新型城镇化金融体系，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在具体操作层面，如何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快速适应，并加大力度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需求，助力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和顺利转型，则是当下金融行业亟需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具体而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构建法律法规政策支持体系，分层强化并落实监管职能责任的转变。可以考虑研究出台各项加大支持中小微企业、“三农”的政策措施，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力度较大的金融机构可在存款准备金、再贴现、再贷款、合意贷款规模等方面给予倾斜，在相关新金融业务开办、金融市场准入等方面给予优先考虑。可以考虑通过给予税收优惠、财政补贴、风险补偿等方式，规范和引导金融机构及民间融资将更多资源投向新型城镇化，探索建立中央和地方分层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为金融支持城镇化的推进提供更有效的激励机制以及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保障。

二是构建差异化的金融组织体系。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在服务对象上，要“大小并举”，在注重大企业、大城市的同时，也注重小微企业、小城镇；在注重企业法人的同时，也重视自然人的融资需求。要结合各地新型城镇化特色，通过创新发展各类草根金融机构和组织，增加小城镇基础设施、机构网点和人员配置，把更多的金融资源送到最基层、有需求的每个小企业、家庭和个人手中。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应面向社区，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相融合，加强对农业产业化企业、城镇中小微企业、家庭农场等领域的金融支持。为此，可考虑放松金融管制，在有效防控内部操作风险的前提下，通过适当放权激发基层网点的工作积极性，提高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服务能力，同时降低门槛，大力发展立足本土和社区的各类小型金融服务机构。

三是构建微观金融组织、服务和产品创新体系。积极推动大银行下沉服务，设立小微企业专营机构，做精做专城商行、农商行等地方小法人机构，扩大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组织试点。可根据小微企业、“三农”的特殊需求和抵押物不足、信用记录不全等特点，量身定制相应的新型金融产品和服务，开发运用供应链融资、订单融资、应收账款融资、存货融资、小企业债权集合信托、网络联保、信贷工厂等针对中小企业的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模式，积极发展满足多样化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以实现更好地为新型城镇化提供新金融服务的目的。

四是构建地方性信用与交易体系。可考虑通过创建信用村、信用镇、信用镇分层信用体系，建立农村信用信息数据库，形成并逐步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同时，可考虑积极引入住房等各类抵押（质）押物的市场化定价机制，通过农村信用体系的健全和完善，解决“三农”贷款抵（质）押物不足的问题，让它们变成标准化、可交易的产品，进行有序流通，从而降低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金融风险。

五是构建地方性的直接融资体系。实现以间接融资为主向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并重的转变，更加注重小微企业、家庭和个人的财富管理和资产增值需求。可考虑通过政策引导和金融创新，开办消费金融公司等，运用私募股权机制和各类民间资金转化平台，把民间资金调动起来，让更多的信贷资金配置到私营部门，让其投向实体经济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在交通、绿化、供水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可实行政府调控下的市场化运作，形成民间资金支持新型城镇化和中小微企业发展的资本集聚和区域循环机制。

本版编辑 欧阳阳
邮箱 jjrbsj@sina.com

将缩小区域差距转化为发展新动力

国家行政学院 车文辉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来说，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必然要面对的重大课题。但是，发展差距就是发展空间。消弭区域差距的过程，就是在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生成新动力的过程。其着力点就在于通过制度创新，优化空间结构，实现经济内生发展。

经济区域间发展水平的梯度性是大国发展历程中的显著特征。它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转化为大国经济走向均衡的潜在动力，也可制约大国经济持续发展。因此，如何把区域间的差异转化为使经济保持更长时期、更为稳健增长的重要资源，实现经济的梯度落后性向经济发展的梯度增长效应的转变，是大国发展中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一）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中国发展历程上不可避免的客观事实。

其一，地区发展差距依然较大。一是区域间绝对差距仍较大。二是人力资源——尤其是科技人才资源分布不均衡，东部地区明显优于其他地区，严重制约着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三是基础设施建设差距悬殊。欠发达区域交通网络布局不完善，包括公路、港口和机场等在内的交通基础设施总体技术水平偏低，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缺乏协调配合，结构性矛盾突出。

其二，国土开发与建设布局仍不够合理。我国资源分布的地理不均衡和经济布局与资源分布的不协调，加之改革开放以来制造业生产能力向沿海地区过分集中，国家不得不进行大跨度、大规模的能源与资源跨区域调动，增加了发展的成本。虽然近年东部地区加快了转型升级，

但需求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有待优化、能源资源约束强化等深层次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在创新平台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不小差距。而中西部地区多为资源输出型区域，产业结构比较单一，效益总体不高，发展稳定性较差，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比较脆弱，使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增加了难度。

其三，资源与环境约束增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仍将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高速发展时期，资源与环境的约束日益明显，区域发展挑战仍大：一是当前我国的发展基数和标准比较高，要继续保持现有的增长速度和继续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就需要有更多的资源消费来保障；二是由生产环节造成的环境压力很难得到化解，由生活环节造成的环境压力将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不断加大，能源、淡水、矿产等战略性资源不足的矛盾将越来越突出，土地供应难以以为继、环境承载能力难以以为继、能源供应难以以为继；同时，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我们面临节能减排方面的国际国内双重压力。

此外，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国内区域经济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跨行政区划的经济区域。如何打破传统体制的制衡，推动区域经济朝一体化的方向发展，成为当前我国区域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

（二）

如何将区域落差转化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新动能，需要通过制度创新，优化空间结构，实现经济内生发展。

第一，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市场机制，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推动东、中、西部地区在广度与深度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着眼于推进区域互动合作，完善财政税收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完善产品市场、劳动力人才市场、资本市场、产权交易市场、外汇交易市场等市场体系的建设，增强区域创新能力，形成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区域合作的制度体系。

第二，加强政府宏观调控。政府的作用范围主要是提供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弥补市场失灵，维护法律秩序，体现社会公众利益以及为区域经济开发提供规划、指导和协调。在现阶段，我们需要更多地注重公平的目标，采取非市场调节的方式，从多方面扶持、引导、刺激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减小区域间的差距，弥补市场效应的不足。在经济政策、资金投入和产业发展等方面加大对不发达地区的支持，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及其他相关政策，以引导生产要素和社会资源的流向，使资本、知识、技术、商品和人力资源向不发达地区流动，加大中央对不发达地区的生产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力度，从而加快这些地区的发展。

第三，培育、提升多极并进的区域增

长极、增长轴。一是提升东部沿海发展轴，带动沿海地区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增强综合竞争力。强化沿江发展轴，打造贯通东中西部经济联系的战略通道。二是引导重点城市群集聚发展。紧紧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主线，以城市群为核心，积极培育特色产业体系，增强中心城市的辐射力，形成若干有较强带动作用的区域性增长极，推动新一轮经济社会大发展，打造全国区域统筹发展的主要载体。比如，着力把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重点城市群建设成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的世界级城市群；着力增强辽宁沿海、山东半岛、成渝等城市群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加快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和现代物流业；引导武汉、长株潭、广西北部湾等中西部城市群加快发展。三是重点扶持中西部地区参与全国和全球经济的主要网络节点。目前，中西部地区缺乏国家中心城市和巨型增长极。中西部中心城市产业处于价值链的低端，支撑能力不足，引领地区发展能力弱。今后，应从区域比较优势出发，利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大契机，在产业配置和重大项目安排上向中西部重要城市和地区倾斜，在未来人口密集区的长江中游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成渝地区等区域，选择若干发展条件较好的中心城市进行重点建设，将中西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成为国家某行业中心，形成符合产业发展规律、相互支持、相互协调的区域经济结构。

顺应规律变化 推动工业转型

中国社科院工经所 吕铁

如何看待工业增长前景，我国工业的中长期增长态势将呈现怎样的格局，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

首先应该看到，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工业面临的发展环境和条件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世界经济由金融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国际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充满变数，这会对外向度较高的中国工业产生一定冲击；另一方面，随着发展条件的变化，我国工业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工业增长潜力下移的新阶段，工业增速的下降又将进一步增强工业转型升级的紧迫性。

改革开放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化的进程快速推进，工业经济迅速崛起，到2010年，我国制造业规模已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虽然我国工业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但如果进行分时期考察，在看到不同时期的工业增长率存在一定差异的同时，还会发现自2008年以来，工业增长率的均值已出现下降趋势，并且这种下降不仅是周期性的，而是具有发展阶段转换带来的趋势性减速的特征。

以若干关键年份为节点，可以将1978年以来我国工业的增长历程划分为4个时期：1978年至1992年的转轨初期；1993年至2001年的全面转轨时期；2002年至

2007年的深化开放时期；2008年至今的转型时期。在1978年至2007年长达30年的时期内，我国工业始终保持了两位数以上的高增长率，而且均比同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高出1个百分点以上，表明工业增长是推动整个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分析起来，我国工业30年来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通过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抓住了实现结构性改革带来的赶超收益的机会。

但在进入第四个时期即2008年以来的这一时期内，我国工业的增长速度与之前3个时期相比出现了明显下滑的态势。2008年至2012年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为9.79%，跌落至两位数以下。有分析认为：导致我国工业增速下降的主要因素，除了周期性因素和国际金融危机这个外部性冲击因素的影响外，发展阶段变化的作用和原有的发展方式面临的约束增强才是主要原因。一是廉价要素供给的保障程度下降。二是技术引进难度加大，技术学习效果下降。在赶超阶段，由于中国与工业发达国家存在明显的技术差距，因而支撑

工业增长的技术资源可以相对容易地取自工业发达国家，另一方面，此时工业自身通过“干中学”也可获得较好的技术学习效果。随着我国工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其技术水平与国际技术前沿的差距不断缩小，当前我国工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难度有所加大，其技术学习效果也明显减弱。三是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不利影响。实施出口导向发展是过去30年来推动我国工业高速增长的重要战略和成功实践之一。粗略估计，我国目前的工业生产能中大约有20%是满足出口需求的。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由新兴工业国家“供给替代”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推动的全球经济再平衡正在强制各国经济自我调整。在此背景下，我国工业庞大的产能特别是面向出口需求的那部分产能将面临痛苦的去产能化过程，由此将会对未来较长时期内工业增长潜力的提升产生压制作用。综合以上分析可以认为，2008年以来我国工业的增速下降是周期性因素和趋势性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但趋势性因素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

随着不断扩大要素投入以及通过获取赶超效应推动的高速增长阶段的结束，我国工业迫切需要转向以稳健增效为目标的新的增长模式。所谓“稳速”，就是要以新阶段的潜在增长区间作为把握工业实际增速的基准，而不应再期望通过实施强力的扩张政策将工业增速重新推高到超出潜在增长区间上限的水平，因为这样的高速既不可持续，还会导致工业增速大起大落。所谓“增效”，就是要以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新阶段工业增长的主要动力，努力实现工业增长由过去的要素投入驱动向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驱动的转变。而要顺利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在处理好速度、结构和效率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体制机制建设，加大推动工业增长模式转型的政策支持力度。一是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提高针对性，为工业增长模式的顺利转换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二是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着力构建与新的工业增长模式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条件；三是要加快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进一步扩大内需，推动工业增长进入稳速增效的良性循环。

想群众所想 解群众所需

——评《理性看 齐心办》——理论热点面对面·2013》

马志刚

风，进一步展示了通俗理论读物的魅力，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

理论只有与群众所思所想相结合，彻底内化为群众的精神和思维，才能成为推动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理性看 齐心办》确立的公平正义怎么保障、收入分配怎么改革、环境恶化怎么扭转、食品安全怎么监管、教育质量怎么提高、养老难题怎么破解、道德失范怎么治理、铺张浪费怎么杜绝、干部作风怎么改进等9个选题，都是社会高度关注且与民族复兴、国家发展、人民幸福息息相关的话题，以群众的视角观察社会现实，以真挚的感情关照百姓生活，以鲜明的态度维护群众利益，做到了与人民群众面对面、心贴心，做到了有担当又不说空话、大话、套话。

比如，面对人民群众对分配不合理现象的关注和焦虑，《理性看 齐心办》从收入差距怎么估计、收入分配改革难点在哪里、收入分配改革从何处突破、收入倍增怎样实现等层面，对这一

焦点问题进行了理性分析，对其中的困惑和误解进行了厘清，对如何实现收入倍增美好目标进行了详细阐释，同时还坦言，“现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已经有了总体方案，但这个方案只是勾勒了一个大体框架，深入推进改革还有不少难题尚未破解，应制定更加具体、更加明确的政策，真正把‘原则’转化为‘细则’”。分析入理，语言坦诚，把真实情感渗透到理论和政策的宣传阐释之中，做到情理交融，势必能产生“理到情也到”的效果。

又如，在谈到养老难题时，书中说道，“现在，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94亿，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面临挑战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直指我国面临的养老困境。对如何解决，书中从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和制度建设入手，作出了有针对性、有说服力的回答。

推进理论大众化，就要直面大众关切，

着力回答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大众关切、百姓问题，体现着时代要求、反映着社会意愿。只有积极面对、主动回应，找准理论阐释与群众关切的契合点，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才能展示理论的彻底性。一部优秀的通俗理论读物，总是与大众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总是与人们的思想脉搏同频共振。可以说，该书所涉及的问题，都是群众的关切，都说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推进理论大众化，就应把人民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群众反映什么就回应什么，群众困惑什么就回答什么。要深切感知普通百姓的现实生活，感知人民群众的内心世界，在与基层群众的深入交流中，把准社会“脉象”，真正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疑所惑。唯有回答、解决映照社会现实、关乎民心民意的真问题，才能彰显科学理论的价值和力量，最大限度地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正能量。



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13年推出的《理性看 齐心办——理论热点面对面·2013》，直面热点，理性分析，以准确的选题、透彻的说理、清新的文